

只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,对于有正常智力的人,读书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我在满五周岁后,父亲明察秋毫,认为我可以上学了。经事先联系,他带我去离家很近的一所小学,让留美归来戴金丝边圆框眼镜的女校长面试了一番,就插班到了一年级第二学期。这所名叫圣心小学的教会学校,每天晨课时要重复背一段《圣经》。用现在的话比方,就是单曲循环,接着再背中山先生遗嘱节录,记得最后两句是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!”戴着白色“馄饨帽”的黑衣嬷嬷拿着红木戒尺在课堂里巡视,谁像南郭先生一样滥竽充数,就要打手心。被打过的,手心会发烫发红几十分钟,究竟要多久,要视嬷嬷的力道和被罚者皮肤的厚度而定。记得小学国文课里有“凿壁偷光”“悬梁刺股”的故事,读了很觉励志治愈。但在家晚读时,有40支光的电灯泡熠熠亮地照着,根本不需要去凿自家的壁偷别人家的光。如果遇到灯火管制,那么凿了壁也没用。也曾想悬梁刺股,可是作业早早做完了,一点也不困。何况住的是新式里弄房,无梁可悬。如果硬要照搬,在众目睽睽下岂非成了行为艺术?这所教会小学规定,四年级前男女生可以同校,读完四年后,男生要离开自谋出路,现在想想觉得也有道理。那时只得离开这所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为邻的小学,到别的小学就读,但觉校风不如原来的学校,因此孟母三迁似的迁了好几所。小学毕业后便进了向明中学读初中,高中去了位育中学。在读初中阶段,发现自己的数理化有点不如吾意,看来

读书的易和难

王纪人

难以“走遍天下都不怕”了。有一次物理小考,我早早就做好了,几个物理尖子都还没有交卷,在核对了几遍后终于熬不住第一个交卷,结果批下来成绩只有五十分,这对我打击颇大。物理老师很严厉,对我这个班长还算客气。坐在我边上的熊孩子就倒霉了,屡次被物理老师用不断掰下来的粉笔头如制导弹似的连续精准打击,甚至飞来黑板擦,还要捡起来恭恭敬敬地送到讲台上。我对这位同桌很表同情,其实他脑子很聪明,人也活络,就是有点多动症。由于有自知之明,我大学考的是中文系。留校一年后,考上了北大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专业。这样,在学校整整读了十九年半,四舍五入就是“十年寒窗”的一倍了。至于我自己带过的博士生和博士后,比我又多读了三、五年,毕业或出站时,至少三十出头了。有的早已成了家,还生下了孩子。我把博士生的妻子或孩子,戏称为博士生后。对于研究生来说,读书是难的。因为在中国,包括大学本科在内的学习基本上是一种知识的积累,一篇学士学位论文,八千字就够了。进入研究生阶段,才是研究型和创新性的学习。以我评阅过的美学和文艺学博士学位论文为例,需要阅读国内外几十种参考书和上百篇的相关论文,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英、德、法的原文,还没有中译本。十几年来我持续参加过校外博士论文答辩,凡撰写论文前的读书阶段做得特别好、占有第一手资料充分的人,他们的论文往往也写得更扎实



小王子 (插图)

赵晓音

绎红色封面的第七版《辞海》即将面世,使人心生欢喜!岁月飞逝,往事并不如烟!回想我早年参加了《辞海》修订的编辑工作,从“试行本”出版至今历经几十个春秋。现在,在我晚年,还有机会参加新一版的合成版的通读,提出一些修订的意见,私心甚感荣幸。

《辞海》忆语

卢润祥

那《辞海》新生的诞生地、何东爵士老宅故园的小楼庭院花草是不是已经融入了自己的生命?那些陪伴我工作的珍贵的图书古籍是否仍然静好?常常,梦中有前辈身影来到眼前,我也仿佛沿着小楼的大理石楼梯走上了二楼的总编辑办公室,见到过舒新城先生抱病思考修订方案的沉思。听到当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主任杭苇召开编辑会,布置任务时的大声关照。有一天,当时的主编复旦校长陈望道先生来了,他就坐在那玻璃台边题《辞海》书名,这一幕恰为我见,当时先生把写得就不满意的就随手丢在一边。我当时所在的编辑室在小楼右边,四壁皆书,有三个卡片柜。南窗是傅东华先生座位,当时他的译作《唐·吉珂德》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。但他还是一位语言学家,当时被政府聘为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,新中国建立前就出版了《字源》一书,他精通《说文解字》,又精通廿四史,刚为中华书局标点本《汉书》也已出书,这时,正在应上级要求重写《辞海》单字,审音确定义项。余振先生搁下了普希金诗的译笔,潜心研究老《辞海》语词部分之得失。而徐中玉先生则放弃了文艺理论的研究,枯坐办公室制作《鲁迅全集》的卡片资料,为立目寻找例句。写过武侠《大刀王五》的钟吉宇先生也是位老“中华”,办过报纸,又编过字典,这时也正忙了样条。可以说老先生们为了《辞海》新生都或多或少有过放弃和牺牲!更令我深感一生难忘和欣喜的是:“文革”后,还有机会接触前辈来协助《辞海》工作的老报人。时任《新民晚报》总编辑束仞秋先生原本是一位小说家,他平易近人,要我代买每期紧俏的《集邮》杂志。还记得林放的谈笑风生,儒雅谦和,他在《未晚谈》出版后即给我们每人签赠一册。他认真

通读《辞海》,也提出了不少个人的意见。他作为社长却喜欢坐在我的编辑室办公,他作为市政协副主席本可享用小车,但他却情愿每天挤公交,乃至有一次挤掉了钱包。张林岚先生读《辞海》稿件时办公桌上都是书,常常为一条资料复查好几个版本。稿子边提出意见的浮登查不少。冯英子先生来社时间较早,活泼幽默,性格开朗。记得由他主持的“九人

核查小组”曾邀我参加,我们分工通读,写成一份调查报告。他发现把希特勒说成是“人民领袖”等,认为实在不妥,也说明《辞海》改编的必要与紧迫。《辞海》的修订工作严谨而细致,踏实认真而一丝不苟!此中甘苦,冷暖自知,实例甚多:陈炳是我大学同学,巧的是我们都参与了《辞海》的工作。他在审读负责的文艺条目中,发现【殷夫】条有人把稿件中的“结集未能出版”妄改为“未能结集出版”,经过再查,原来殷夫生前就把自己的诗集编好了,并取名为《孩儿塔》,在他牺牲后,诗集即由鲁迅保存下来了,因此怎么能轻率地说“未能结集”呢?因加订正。这位在《舒新城日记》中曾被关注(舒老称赞新来的他工作不错)的陈炳先生已谢世,而他也只是参加《辞海》工作中5000多人中极为普通的一名,他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也值得纪念。

《续修四库全书》(以下简称“《续修》”)是继清代乾隆修《四库全书》以后最大的一项古籍纂修出版工程,囊括了乾隆中期至1911年间出现的重要古籍以及《四库全书》失收的前代善本,共计5200余种。从2004年《续修》立项,至2012年1800册全部出齐,历时整整八年。如此浩大的古籍出版工程,全部由一家地方出版社——上海古籍出版社自筹资金来完成。我当时在影印编辑室工作,有幸参加了借书与编辑工作,往事历历在目。

《续修》的书目由著名学者顾廷龙、傅璇琮为主编的编委会确定。随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借书来作为影印的底本。《续修》收书多,借书任务十分繁重。这项工作主要由我社原资料科主任水贵佑老师主持,先后有三位年轻人协助他,我是其中之一。我和水老师一每到一地,拎着包裹直奔图书馆,进了古籍阅览室,马上填借书单,

书调来后,先核对版本,然后边清点边记录每卷页数、缺损情况等。翻完一套书后,再翻另一套书,直到工作人员要下班催促我们,我们才出去找旅馆。记得去北京借书,为了省钱,水老师带我住在一个很深的胡同里,早上就在小店里买个韭菜合子,边啃边赶往图书馆。看书到中午,跑出来,在大街上吃碗朝鲜冷面,马上回到图书馆。正因为这样抓紧时间,借书工作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。

借好的底本先要复印。那时做影印书还要靠手工剪裁。先让印刷厂印好带有板框的底板纸,编辑再请人剪贴:先把复印件上的古书页面裁下来,贴在底板纸的板框内,再在书口贴上书名、卷数和页码。参与《续修》编辑工作的有10余人,因剪贴工作量大,每位编辑都找了四五人帮忙,剪

贴报酬很低,只有3分钱一贴。有时不小心贴错了还要返工。我们戏称用美工刀裁切复印件为“划鳍丝”。粘贴要用浆糊,买来的浆糊要重新加水调得不厚也不薄,大家各有诀窍。有位同事发明了一个妙法:将调好的浆糊倒在一个平底小盘里,覆一块白纱布,将一枚枚裁切好的细长条书名、卷数、页码等铺放在纱布上,让它们自然吸上浆糊,贴时只需用镊子夹起来,往底板纸的固定位置上一放,轻轻一按即可,省时省力,真是绝了!因为是单面贴,贴好的一本书有将近一尺高,1800册贴稿可以堆成一座小山了。贴稿审阅完毕,编辑和编务组的同志还要对其进行“化妆”,即用白色颜料涂去古书版面上的污迹,文字模糊的地方作适当描润,然后送厂拍照、制版和印刷。

八年编书不寻常

袁啸波

作为影印编辑,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一定的古籍版本知识。有一次我发现从外地借来的一种乾隆刻本的书有残缺,于是到上海图书馆去补页,结果发现上图有完整的雍正刻本,两相对比,雍正刻本更好,于是建议更换雍正刻本做影印底本,得到了编委会专家的首肯。编委会专家十分重视每种古书版本著录的准确性。编辑在审稿时将版本信息的辑封复印一份,集中起来寄给北京图书馆的古籍版本老专家崔建英先生审核。



《续修》出版后,以其高度学术性和珍贵文献价值广受学界好评,曾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。几乎每个有文科的院校都会购买《续修》,利用频率极高,大大方便了传统文化研究者。这也是我编辑生涯中引以为傲的。

喜欢在溧阳路上散步。前些日多雨,蜿蜒曲折的马路上,年代久远的梧桐树叶交错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墨绿,映衬着红砖铺就的步道,仿佛不经意间把你拽进旧日的故事里,让你猝不及防地跌入到某种饱经沧桑的情绪中。

据说,溧阳路是上海花园住宅集聚密度颇高的马路之一。溧阳路辟筑于1889年,旧称“狄思威路”,南起黄浦江畔的虹口港,向西北延伸至四川北路,1943年改今名。四川北路以东,四平路以西,长不到600米的溧阳路上,有着目前上海面积最大、最完整的双拼英式花园住宅群。48幢外貌相似,彼此相连的花园住宅,始建于1913年,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特征,砖混结构假三层,独用一个天井花园。住宅正立面采用拱券式外廊,四坡歇山式屋顶,红瓦屋面上设双坡老虎窗,清水青砖墙面嵌红砖带饰,雕工考究。1994年,溧阳路花园住宅群被列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名单。溧阳路的花园住宅里住过许多文化名人,像1269号是郭沫若故居,1333弄1号是女画家关紫兰故居,紧挨着隔壁1335弄5号是报人曹聚仁的故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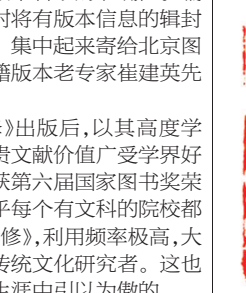
溧阳路1219号是南社耆宿陆澹安的老宅。推开陆宅的桃园铁门,你能发现整栋住宅被疯长的爬山虎层层包裹着,花园里树木扶疏。陆澹安的文孙、著名书法篆刻家陆康说,澹安公是1947年迁入的,一直居住至1980年逝世。陆康回忆儿时住此,最开心的莫过于在花园中嬉戏。作家孔明珠说她小时候拎着两瓶老酒,替父亲孔另境给陆伯伯写信时,曾见过在花园里玩耍的陆康。她还清楚地记得那封信的信封上竖排写着

“专呈,外酒两瓶,陆澹老晒纳,孔毓”。凄风苦雨的年月里,陆澹安不涉政治,经济相对宽裕,而孔家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两位老友之间的通信,很大一部分竟是借钱之类文字往来。孔明珠笑言那两瓶老酒其实是“调头寸的利息”,她著文感叹:“如果彼时陆伯伯明哲保身的话,按理也可以拒绝与父亲来往,不要说二十年的老友,即使一辈子夫妻,在那个年月里,互泼脏水翻脸的不知有多少。记得父亲说到陆伯伯一直用很尊崇的口气,说他是学问家,也是绅士,朋友义气重如山。”在一封封“兄知我甚深”的通信中,孔另境相信,自己的挚友还在那里。

陆澹安旧居在溧阳路近四平路一端,而溧阳路近四川北路一端的1359号,则是赫赫有名的鲁迅藏书室。这是一幢红瓦灰砖木结构、坐北朝南的三层楼房,故居保存。新新中国建立后,此处的藏书由北京鲁迅故居保存。陆广平对于鲁迅藏书的保护功不可没。鲁迅去世后,原配夫人朱安因生活窘迫一度准备变卖鲁迅北京老宅的藏书。后来此事被在上海的许广平及时制止。两个女人,在鲁迅生前对对方或许还保持着几分戒心和顾忌,但因为这件事,开始频繁通信。最后鲁迅藏书是保住了,此后朱安的生活便依赖许广平的接济。对此,朱安是感激的,在她去世的前一天还写信说:“许先生待我极好,她懂得我的想法。”而朱安也极爱周海婴,她给这个一辈子都没见过的“儿子”写了许多信,问身体,问学业,问生活。

对一个地方的记忆,有时其实挺简单的,是一通信,是一间凌乱的小屋,是雨窗下和某人的剪烛话旧,是冬夜炉边心仪的热茶,是襟上袖口沾过的泪痕。书信,记录下的是历史的温存。

“雨冷,酒暖,书香,人多情”,这封来自溧阳路的邮件,仿佛说尽了人生悲欢离合的五味杂陈。



学然后知不足 (篆刻) 陆康

溧阳路,记忆是一封信

沈琦华



明日请看《慢工细活编大典》。责编:郭影